

解讀二二八（節錄本）

作者／李筱峰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開花。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到大後方的中國國民政府，意想不到地成為戰勝者。當時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實際上，那是一次暫時的軍事佔領。十月廿五日，中華民國的陳儀將軍，在公會堂（後來改名中山堂）接受日軍投降，當時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當時一般台灣人民對於所謂「光復」大多抱持歡迎的態度，並以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沒有的熱烈心情，迎接來自大陸的國民政府。例如，曾經在日本時代從事抗日社會運動的人士，如陳炳、葉榮鐘等人，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各地張燈結彩，以迎接國民政府。有一副對聯這樣寫著：「喜離淒風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全島各大市鎮都有當地青年自動自發組織地方團體，用來維持地方秩序，保護日本留下的敵產，以便讓國民政府能順利接收。當時台灣人對於這些來自「祖國」的接收人員的心理，作家吳濁流曾這樣描述說：「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

對於新時代的即將開始，台灣人民充滿著殷切的期待，也編織著美麗的憧憬。特別是社會領導階層的士紳、知識份子，對於與聞地方政治，開始發生興趣，興起參政的熱潮。

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三、四月間選出各縣市參議員，四月十五日，進一步選舉省參議員。省參議員應選名額僅三十名，而全省申請參選的候選人，竟達一千一百八十人之多。其中，以台南縣（日治時代的台南州，包括今天的雲嘉南三縣）來看，應選名額僅四名，而候選人多達四百八十一人。如此激烈競選的盛況，恐怕是人類選舉史上的罕見特例。於此可以想見戰後當時「有知識者都不約而同地想走進政治的窄門」（吳濁流語），也可以了解，戰後初期許多社會菁英對於新的時代充滿著抱負與期待。

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政府卻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做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齊集一體，好像日本時代的

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了這種體制的出現之後，都失望地戲稱它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首先讓台灣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壟斷、特權橫行、貪污腐敗，而且外行領導內行。

國民政府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因此戰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來自大陸的人士所壟斷。例如，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廿一名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台籍人士（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殺害了）。再者。在長官公署的三百十六名中層人員中，台籍人士只有十七人，餘皆大陸人。於此可見，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讓滿懷期待的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感到失望。

大陸人士壟斷權位之後，緊接著是牽親引戚的裙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的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花蓮法院也類似如此；農林處檢驗局的葉姓局長一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經驗的台省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葉局長的二房姨太太來補缺；高雄有一所學校，新任劉姓校長上任之後，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識字的老師，原來這位不識字的老師是校長的岳父大人。這種現象，在日據時代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令台灣人更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日據時代也有「加俸」的差別待遇，但差距還沒有這麼大。

差別待遇還不要緊，外行領導內行才更叫人咄咄稱奇。在大陸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糖廠的主任、廠長；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

以上的不平與不公，都還不是最嚴重的。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按中國在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員到光復區專接收金條、洋房、汽車、高位，和小妾，中飽私囊，民間譏稱他們「五子登科」（五子是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來到台灣的接收人員，也有不少「五子

登科」的人。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員，多係貪污之流…，或公財私用，或敵產擅賣，或浮報不實，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賭場，全無節用愛民，經國濟世之舉措，其腐敗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所以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謔稱為「劫收」。「劫收」後的政治，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這些叫人目不暇給的醜聞，令台灣人痛心疾首。台灣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話，用來挖苦那些來台接收的人什麼都吃，「食銅食鐵，食 kah （鋁），有毛 e，食 kah 鬚簍；無毛 e，食 kah 秤錘；有腳食 kah 樓梯；無腳 e，食 kah 桌櫃」。

在經濟方面也同樣全面的壟斷。代表著當時統制經濟的兩個機構，一為專賣局，一為貿易局。行政長官公署繼承日治時代的專賣制度，對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納入專賣制度；另設貿易局，壟斷了全台的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公營事業又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代的獨占企業。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當時全台人口六百萬，失業人口有四十萬到八十萬的不等記錄。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濫發，一漲再漲，甚致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格，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台北市零售米價在國府接收的一年多後，漲了四百倍。結果民生塗炭，民不聊生…。此外，當時台灣物價的暴漲，也部分因為受到中國大陸本土惡性經濟恐慌的波及。陳儀接管台灣後，雖然採取台幣特殊化措施，繼續使用原有台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台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和超經濟關係。台幣與法幣匯率一貫被壓制為比其台幣實際購買力低，而大陸的經濟恐慌比台灣來得猛烈，物價上漲也比台灣更為厲害，所以無論如何的調整或固定化匯率，以法幣換取台幣來台購買東西，都比在大陸便宜。中國本土的軍政機關一味地利用不值錢的法幣換取台幣，來台搜刮物資；上海等地把華南都市的「民間資本」也大量傾入台灣而大肆購買財貨。結果，台灣的許多物資，陸續被掠回大陸，或被來台的大陸商人掠為己有。

總之，國府接管後的台灣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誠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 F. H. Michael 和 G. E. Taylor 在其合著的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一書中所說的：「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 (looted)，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

由於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因而社會上盜賊四起。尤其是「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一九四六·十·廿八《民報》社論〈要預防年底

的危機》)而更令台灣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駐在台灣軍隊，紀律敗壞，經常欺擾人民，當時的軍紀到底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當時軍紀的一段回憶：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裡，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廿八倍。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經常發生軍警與民眾衝突事件，社會動盪不安。

台灣人原以為同文同種的中國，是心目中可以託付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其實，「想像中的祖國」與「實際的祖國」之所以不同，乃是因為台海兩岸的社會，到了終戰之後，已經發展成兩個體質相當不同的社會了。

台灣自十七世紀移入一批一批的華裔移民，以及出現殖民政權以來，便充分顯現其海洋文化的特性，與對岸的中原大帝國開始大異其趣。即令台灣自十七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被併入清帝國的版圖，但因長期的海禁隔離，台海兩岸仍有相當程度的疏離。到了清末由於劉銘傳的經營，已奠下了一點近代化的基礎，而且在近代化的腳步上，移墾社會的台灣較諸保守的大陸其他地區已稍前一步。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更正式與中國分道揚鑣，走進了不同的歷史軌跡，海峽兩邊社會的差距，也日漸拉開。自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到所謂「台灣光復」的五十年間，被台灣人民所「孺慕期待」的「祖國」，其實都在戰亂動盪之中。反觀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五十年中，除了最後數年因大平

洋戰爭的席捲，以及早期局部性的抗日運動外，大抵都處在和平的時期，這是台灣「不幸」割日之後的「大幸」。再說，台灣雖淪入「異族的魔掌」，但是這個異族，並非「蠻貊之邦」，而是經過明治維新近代化的日本。儘管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的本質是剝削與壟斷的，但在其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確也在台灣投下了建設。經過五十年的不同發展，台海兩邊已經明顯呈現相當大的生活差距。試以最足以代表一個社會的工業化程度和生活水準的發電量做比較。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僅中國大陸人口的 1.2%，但卻使用全中國大陸 23% 的發電容量裝置；一九四四年，全台人口是中國大陸後方的 2.1%，卻使用了大後方的 442% 發電容量裝置。如果再以每人平均分配發電容量來比較，終戰前（一九四五年）台灣人每人平均分配發電容量是大陸人的五十倍；再試從農、工業產值比來對照。一九三二年台灣的農工業產值比為 6：4；一九三七年為 5：5。而中國大陸在一九三三年的農、工業產值比為 9.3：0.7。可見台灣的工業化程度遠超過大陸。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農業產值比率已低，卻能輸出所產一半的糧食，而大陸農業產值比率甚高，卻反而年平均須輸入兩億石左右的糧食。從上列資料看，兩邊社會的差距一目了然。上海《密勒氏報》的報導，對台灣的教育則更加肯定。九月五日該報記者發自台北的稿子談到台灣人的受教水準說：「除實際經驗外，他們都受過小學的強迫教育，據有力觀察家估計，四十歲以下的人，沒有文盲，這是一個六百萬人的好省份，人民都受過教育，對現代工業和現代生活，已有經驗，在日本統治下數十年，不斷為爭取自治而奮鬥，這樣使他們得到自治政府的最大準備，並為新中國蘊藏豐富的模範行省。」，這種進步，連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都坦白承認。他在「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班」致詞時（一九四五年二月，重慶），就說：「日本治台多年，成績甚佳」。日人治台的成績，不僅表現在硬體方面，而且在軟體方面，也有其成效。特別是社會文化的提昇，生活品質的改變。雖然這其中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但是日本人將台灣人過去身上所積留的許多中國舊傳統惡習（如不衛生、不守時、不守信、不負責、打馬虎眼…）確實祛除不少。

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來到台灣觀察後，對於台灣的高文化水準都留下深刻好感。戰後來台的大陸記者江慕雲在《為台灣說話》中，就這樣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般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

一九四五年底，是台灣人歡欣鼓舞「重歸祖國懷抱」的時期；一九四六年裡，則是台灣人心目中的祖國與真實的中國在內心交戰、衝突、煎熬，而產生不適應的時期。在這一年中，台灣人嚐到種種意想不到的苦果大陸人壟斷權位、官

場上貪污腐敗；經濟被剝削、生產大降，物價暴漲，人民生活更加貧乏；軍紀敗壞，擾民欺民，治安嚴重惡化，社會動盪不安…。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台灣人原本從熱望變成失望的心情，已經瀕臨絕望的邊緣了。誠如當年二月廿七日《民報》的社論中所提出的警訊：

最近物價突變地在高漲，整個的經濟社會在震盪著、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奔走駭告朝不保夕。誰都在希望政府能夠有辦法，切切實實來個解決。人民實在太夠苦了。再提起日本投降時所自設想的美麗遠景，那只有癡人。人民現在沒有絲毫的奢望，只求在最底限度的安定生活。…（中略）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其中間的距離加緊地在離開，這種社會實在太危險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對立，這是社會不安的根源。這個趨勢走到極端，便會變成整個社會的動亂。

非常諷刺，也非常靈驗的，就在這篇呼籲要防範「整個社會的動亂」的社論發表的當天，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了查緝私菸的衝突，引爆了牽動全島的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苦苦哀求勿全數沒收，查緝員以槍管敲擊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而暈倒，圍觀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路旁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人員法辦，但無結果。

廿八日上午，群眾赴專賣局抗議，衝入台北分局，將許多文卷、器具擲出到馬路上焚燒，並且打傷三名職員（一說死一人）。下午，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不料公署陽台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至此，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動，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警備總司令部宣佈戒嚴。由於青年民眾進入廣播電台（位置即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向全島廣播事情發生的原委，並呼籲各地民眾起來響應，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擴及全台全島各大市鎮皆發生騷動，憤怒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毆打大陸人，發洩一年多來的怨懣，陳儀宣佈戒嚴，軍憲則開槍鎮壓民眾，雙方傷亡頻頻傳出。各大城鎮的青年、學生，及退伍軍人組成的臨時隊伍，試圖控制軍警單位的武器彈藥，但他們大都是臨時起事的烏合之眾。較具規模的是活躍於台中一帶的「二七部隊」（以事件係二月廿七日發生而得名）；而較激烈的衝突，則是發生在嘉義水上機場包括阿里山鄒族原住民及平地漢人組成的民兵與駐守機場的國府軍的攻防戰。高雄市內火車站附近也有青年學生與國府軍隊之間的對抗。

三月一日，由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推

派代表謁見行政長官陳儀，並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儀應允，於當日十七時在電台廣播稱：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民眾；三、禁止軍警開槍；四、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員參加。會中並決定變更該會組織，增加陣容，容納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各方代表。會議進行時，場外仍頻聞槍聲，於是有人責難，認為開槍均由警察大隊所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隊，但無結果。

三月三日，改組擴充後的處理委員會再開會，商定軍隊於十八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和青年學生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

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決議再擴大組織，在各地組織分會。推派代表往見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要求禁止部隊再出現街頭。並向省內外廣播事件經過，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政治改革，並無其他任何目的。

三月五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正式通過組織大綱，明白揭示「改革台灣省政」的宗旨。而全省各縣市以各縣市的參議會為主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分會，也已紛紛成立，爭相開會討論，並提出改革政治的要求。

行政長官陳儀，對於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請兵來台。

由於有處理委員會的居間協商，呼籲各地民眾不可胡亂毆打外省人，所以到了三月五日，各地騷動（除嘉義一帶）已逐漸平息。但是，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的一面之詞，完全不理會外國大使館的勸告，甚至連台灣民間團體代表的上電請願與建議，也置之不理，在事態已逐漸平息的三月五日，冒然決定派兵來台。由劉雨卿所率領的第廿一師，已在此日接獲蔣介石的命令，準備出發開往台灣。

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

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在紊亂的會議中，通過宣傳部長王添燈所提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提出具體的善後處理方案及政治改革要求。除三十二條要求外，會中又追加十條要求。獲一併通過，其中包括取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等。綜觀這四十二條要求，在今天看來，無甚了了，許多都是我們今天正在享受的起碼的民主條

件而已。

這三十二條（外加十條）的要求，經向陳儀提出。陳儀在未及詳讀其內容，就將之擲地，震怒拒絕。陳儀為何此時開始翻臉不認帳？因為他知道南京派來的軍隊已經出發，即將抵達台灣。因此他有恃無恐，不再理會他原先所認可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四十二條要求的隔日（三月八日）的傍晚，國府軍廿一軍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根據一位基隆市民向台灣史學者楊逸舟作了目擊證言，說：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楊逸舟又記述著「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用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捆成一團，拋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的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僅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恐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的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

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們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

部隊掃過基隆後，當天晚上進入台北市。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中，記述當時的情形說：

天未黑，馬路上行人就已絕跡，家家戶戶，都關門閉戶，消滅燈火，只有時斷時續的小孩子啼哭聲，陰雲籠罩著全台北市，一陣又一陣的陰風搖動榕樹。約在十時以後，圓山方面忽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機槍聲音，接著長官公署，警備總部，警務處，供應局倉庫，警察大隊，鐵路警察署，察訓練所，台灣銀行，法院等處，都是大砲、機槍、步槍，響成一片，再接著各馬路上皆是機槍、步槍的聲音，全市浮遍了恐怖的噓噓子彈聲響，人聲則一點都沒有，人們在黑暗中不敢睡眠，都知道是國軍來了。人人害怕，怕大禍臨門，好不容易度過了黑夜。

隔天（三月九日）上午十時，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引導奉派來台調查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著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個屍體說：「這些是昨晚進攻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然則，該處附近並無戰鬥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學生。原來那青年學生，都是陳儀所承諾了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決議派來維持治安與交通的青年學生。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曾提到軍隊濫殺的情形，茲引一段如下：

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醫院的一位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捆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身體。另一個外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三月十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數日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開會地點中山堂，自三月八日下午以後，頓然成為慘絕人寰的殺戮場。根據一位法官向楊逸舟的口述：

陳儀於八日下午，最先派了一個大隊包圍中山堂，其中的一中隊衝進中山堂內，把各樓各室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學生、青年共兩百多名，亂殺一陣。有的被

刺刀刺死，有的被推出窗外。當中有幾個女學生，被抓住長髮拋出窗外。發出悲鳴，青蛾似地從空中亂舞而下，罵著中國兵：「鬼畜生的支那兵！」、「阿姆！救人啊！」，直到氣絕。從四樓掉下來的人，頭破骨折，當場死亡。但從二、三樓被拋出來的人，只會半死。這時在外面待機的士兵，就用刺刀補死。屍體手上帶錶的被切斷手掌，指頭帶戒指的被切斷手指。愈來愈多的士兵在搜索屍體身上的口袋，鈔票被搜光。

自九日起至十三日之間，足足四晝夜，到處都是軍隊在開槍，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市民因要買糧外出，動輒遭射殺，因此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是屍體。楊亮功的報告中，談到三月十日當天外出看到的情形：「我借用長官公署轎車。車旁站有憲兵以示警戒。所過街道，哨兵林立、行人斷絕。時見有死人，橫屍於途」。

不僅台北市如此，其他部份市鎮，也都隨著軍隊的來到而陷入恐怖的大肅殺之中，許多青年、學生、民眾，一卡車、兩卡車地被捕捉而去，一去不回。各地的殺戮慘狀，實在不忍卒睹，也不忍盡書。以高雄市來看，彭明敏的回憶錄這樣記述著：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人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於事件後曾派員回台就事件做調查，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三)台北別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坦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戮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而處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陳儀當局自三月九日以後，即開始有計劃地逮捕台灣的知識菁英。許多著名的教授、律師、醫師、作家、民意代表、教員…等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

捕，或下落不明，或公然處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參與任何暴動，但卻慘遭不測。

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教授林茂生，於三月十日清晨被謊稱台大校長有事找他的情治人員帶走，一去不回。據聞，其屍體被裝在麻布袋內，棄入淡水河裡。

同樣也是從哥倫比亞留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大公企業的創辦人陳炘，於三月十一日清晨六時許，在病榻中被刑警叫走，也一去不回。

省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燈被憲兵抓走，最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

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弟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著名的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三月十日左右展開的大整中被捕遇害，連屍體都下落不明。

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被槍殺後，屍體棄入基隆海邊。

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與其他七名地方人士被士兵逮捕後不到十二小時，就被槍殺於頭園鄉，中彈後被推入土坑掩埋。

著名的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幾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柯麟等人，因擔任「和平使」赴水上機場交涉，卻遭逮捕，最後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

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都一樣遭士兵逮捕，槍殺於岡山通往大岡山的平交道旁，死前受盡酷刑，鼻子、耳朵都被割掉。

花蓮的縣參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於四月四日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鎮郊外的公墓槍斃。身上身穿衣物被剝洗一空。

諸如上述這類菁英分子遇難的個案，實在多不勝舉，而且他們之中，幾乎都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

遇難冤死者，多不勝數，至於被捕坐獄者，則更不知凡幾。在這裡，我們就略而不例舉了。

但不得不提的是，許多在動亂中，勸人勿妄動，保護大陸人，出面調解的地方

領袖，反而在大整肅中被捕遭陷。

而許多平日敢於直言不諱的民間報刊，如《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也遭陳儀當局查封。

三月廿日，長官公署開始在全島各地展開所謂「清鄉」的行動以連坐法的威脅，要求民眾交出武器和「惡人」。在「清鄉」的過程中，各地不斷有人被捕槍斃，且多未經公開審判。台灣到處充斥著冷冽的肅殺之氣。

總計二二八事件期間，總共死傷多少人，至今仍無精確的定論，不過，最常聽到的講法，死亡人數約在一萬至兩萬人。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不過，許多避居海外的知識份子，在絕望之後，另謀他圖，開始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現代文化叢書（六）

解讀二二八（節錄本）

感謝 李筱峰教授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李筱峰

出版／財團法人 現代文化基金會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27 號 2 樓

電話：(02) 2357-6656 傳真：(02)2356-3542

網址 <http://www.wufi.org.tw>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郵政劃撥帳號 19276830 戶名 財團法人現代文化基金會

執行編輯／蔡育臻

出版日期／2004年1月初版